

文史资料选刊

第四期



- 燕墩.....沈信夫 赵润田
抗日战争中的先父司徒美堂.....司徒桂
杨绍萱与《逼上梁山》.....翟伯龙
金鱼池和北京金鱼.....宋家玲
说“寒门”.....高凤山 李启元
“花市这条街”专栏.....陈德光等
“北京国剧学会”始末.....何建之
闻名遐迩的大北照相馆.....王永斌
炒肝老店会仙居.....马长林
旧京轶闻散记.....辰 雨
清末以来的北京玉器业(下).....高 忠 王明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崇文区委员会编

燕 墩

沈信夫 赵润田

出永定门南行约500米，路西侧有燕墩，或写作“烟墩”。1984年1月定为北京市崇文区文物保护单位。现圈入某五金行后院仓库内。1985年5月，我们见到该仓库韩云智同志，蒙接待。据云，此院在日本军占领时为汽油库，国民党时仍旧。他于解放初期随五金商店来接管此处，至今已三十余年，经常有寻古者来访此墩。1975年唐山地震波及北京，所有房屋皆动摇，此墩巍然不动。附近老人呼此墩为“小阜”。昔年有自海淀区来访的一位老人说，早先东南西北四城，各有一墩，作“镇气”用。余皆湮灭，惟此墩独存。清同治间人李静山《增补都门杂咏》有《燕墩》诗注“南方之镇”四字，诗云：“沙路迢迢古迹存，石幢卓立号燕墩，大都旧事谁能说，正对当年丽正门”。从此诗可得三点启示，①海淀区老人说是有根据的；②此墩元代已有；③当年是正对丽正门（即今前门）的，如今偏西，明代修建城墙时整个北京城东移了。建设详情不见记载，所以诗人也叹“谁能说”了。

墩为四方形，大型灰色城砖砌成，下宽上窄，以求平稳。下基四面各宽19米，高18米，墩上四周原有高50公分的女墙，现已毁坏。从它的建筑位置与所用之砖来看，似为明代筑北京外城后的产物。墩下层的大砖已部分剥蚀粉化。墩北面有石门二扇，高二米，宽70公分，“文革”中毁其一，尚有一扇卧地上。现有的木质红漆门，系1985年，崇文区文化文物局仿制。门开后，有砖阶43层，约半数粉化。墩面正中有四方形土坛一座，正南有石阶二层可上，惜已残破。土坛正中立长方形石碑一方，承以白石菩提座（亦名须弥座）。座宽及高各为1.9米，约20公分陷土中。菩提座四面各雕花纹五层：第一、五层是龙、云，第二、四层为菩提珠和菩提叶；第三层为牛头马面及佛象，它的排列是：牛在正中，两旁为佛象，佛象两旁为马面；菩提座的四角各刻佛象一尊。所有石雕皆面目不全，半为自然腐蚀，半为人弄坏。

碑身每面宽1.58米，高约8米，南、北碑面四周刻以云状花纹，宽10公分。南面刻有《皇都篇》，北面刻有《帝都篇》，皆清乾隆十八年“御笔”。汉，满文对照。每面汉字八行，阴文楷书，每字略扁平，宽7公分。碑东西两侧无字无纹。南北向的碑文，既高又剥落多处（北向尤甚），大半不能辨认，今参照《日下旧闻考》移录如下：

燕墩御制皇都篇（按：原文为繁体字下同。）

皇都者，据今都会而为言，约形势则若彼，详沿革则若此。盖不如研京十年，练都一纪，鸿篇巨作，纂组雕龙。若夫文皇传十首之吟，宾王构一篇之藻。节之中和，固所景仰；归于睽遇，亦用兴怀。俊逸清新，古人蔑以加矣；还淳返朴，斯篇三致意焉。

惟彼陶唐此冀方，上应帝车曰开阳。轩辕台榭虽莫详，职方有幽无徐梁。要之幅员长且广，山河襟带具大纲。列国据此士马壮，可以雄视诸南邦。辽金以来始称京，阅今千

7146/2P

载峨天阍。地灵信比长安长。玉帛奔走来梯航，储胥红朽余太仓。天衢十二九轨容，八旗居处安界疆。朱楼甲第多侯王，槐市陆海无不藏。富乎盛矣日中央，是予所惧心彷徨。

大清乾隆十八年夏四月之吉御笔勒石永定门南皋。

燕墩御制帝都篇

帝都者，唐虞以前都有地而名不著，夏商以后始各有所称，如夏邑周京之类是也。王畿乃四方之本，居重驭轻，当以形势为要。则伊古以来建都之地，无如今之燕京矣。然在德不在险，则又巩金瓯之要道也。故序大凡于篇。

天下宜帝都者四，其余偏陋无足称。轩辕以前率荒略，至今涿鹿传遗城。丰镐颇得据扼势，不均方贡洛乃营。天中八达非四塞，建康一壑何堪凭。惟此冀方日天府，唐虞建极信可征。右拥太行左沧海，南襟河济北居庸。会通带内辽海外，云帆可转东吴杭。幅员本朝大无外，丕基式廓建两京。我有嘉宾岁来集，无烦控御联欢情。金汤百二要在德，兢兢永勗其钦承。

大清乾隆十八年夏四月之吉御笔勒石永定门南皋

《皇都篇》的大意是：赞美北京地势雄壮，辽金以来建都于此。地势比长安还好。而今四方朝贡，物富民丰，八旗安居乐业。朱楼大厦，藏着水陆奇珍。清朝有如丽日正中，尽善尽美。《帝都篇》的大意是：自古以来，做皇帝的皆有首都。中国宜于做首都的地方有四处，北京最好。它右有太行山，左有东海、南临黄河，北有居庸关，然而主要的不在山川形势，而在于仁德，这种自我歌颂的文章，虚伪夸大，统治中国 人民27年的清王朝，有什么仁德可言呢！

碑顶有石檐，面积比菩提座为大，檐下有石雕三层：第一、三层为双龙在云中夺珠，第二层为菩提珠和菩提叶。檐上为屋脊，正中有石珠一枚为屋顶；屋顶四角雕四龙为吻，龙首向石珠，龙身曲折奔腾，四爪张开，龙尾翘起，呼之欲降。虽在数丈地外视之逼真，且有明显地多处剥落。

以上是燕墩的主要情况。在近代出版介绍北京历史及名胜古迹的一些书中，除《日下旧闻考》和《宸垣识略》外，几乎都没有提及。上述二书，亦语焉不详。从清人李静山的《增补都门杂咏》中，才知道燕墩是元代旧物，但在当时《杂咏》成书于清同治十一年左右）已无人能说了。因此，关于燕墩的建筑年月，明人的修复情况，均不甚了了。希望通过这篇抛砖小记，把这个久不为人注意的古迹发掘出来，供人观赏。

1985年7月初稿

抗日战争中的先父司徒美堂

司徒柱

先父司徒美堂，十三岁（公元1881年）就到美国旧金山当小工，摆货摊，后来渐渐挤入中层社会。亲历和目睹华侨受人侮辱的情况，立志要为华侨争气；要提高祖国的国际地位，使外人不致轻视。老人家十七岁参加了洪门即致公堂。这是当时在美国半公开的华人集团，对外是维护华侨利益，对内是爱民族爱国家的组织。1904年，经人介绍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当时美国政府不让孙中山登岸，老人家主张将加拿大洪门的财产押给银行，担保孙中山先生登岸向华侨宣传革命道理。在中山先生的影响下，老人家也懂得了救国救民的道理，立即向华侨宣传，募集资金，从经济上帮助孙中山先生。在孙中山先生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缺乏旅费，先父和几位洪门兄弟给予资助。中山先生逝世后，因各种原因老人家对国事曾一度消极。军阀混战中，老人家不参预其事，因此很少对我们谈论。”七七事变”勃发、日寇大举侵吞中国，老人家非常关心，认为这是有关中华民族存亡的大事，立即组成“旅美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亲自四出奔走，宣传抗日救国的重要性，呼吁旅美华侨捐款救国。当时国民党的海外部，在美国大肆活动，虚伪宣传国民党如何抗日，只字不提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老人家虽明知虚伪，但在当时条件下不便公开声辩，以免影响侨胞的积极性。于是把募集来的款项，一部分直汇重庆国民党政府，一部分通过在美国进步组织寄给八路军。

1941年夏秋之间，重庆政府为使老人家向海外华侨，募集更多的捐款，给以“行政院参议”虚衔，邀请回国参观。老人家为了想亲眼看看祖国抗日的真实情况，以便对海外侨胞宣传募款，就在1941年12月初，由旧金山乘邮船经菲律宾到香港。这是老人家侨居海外六十余年的第四次回国。这时我正在香港家中，全家都非常高兴。不料还不到一个星期，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偷袭了美国在远东的海军根据地珍珠港，接着就向新加坡、马来亚、香港进军。香港市面立即混乱，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当老人家到港时，国民党海外部、在港的洪门兄弟和亲戚故旧，都去欢迎。紧接着洗尘接风，开欢迎会。在洪门兄弟举行的欢迎会上还照了像，照像馆老板黄堂也是洪门兄弟。谁知由于这张照片惹出来许多麻烦。在许多宴会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故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女士的一顿饭。宋故主席与老人家以前在美国就认识，这时她住香港坚道（地名），久别重逢，自然非常高兴。这次宴会宾主共有五人：宋庆龄、何香凝、何的女公子廖梦醒和我们父子。在席上，老人家自然问到抗日情况，主人等详细而翔实地作了介绍：国民党明为抗日，暗中别有阴谋，“七七”以来，节节后退，如今是坐在重庆看共产党和日寇作斗争，同时默察国际形势，以便收渔人之利。老人家听了恍然大悟，对共产党八路军产生了崇敬钦佩之情。回家后对我说：“真没想到国民党如此蜕化，不可能救中国。这个重担，恐怕只有共产党才能挑得起！”这是老人家对抗日救国形势的第一次了解，这个了

是很重要的。后来我们才知道，廖承志先生这时还在香港与广东之间奔走国事，但他不便正式出面。

日寇进攻香港的形势日紧，香港总督感到自己孤掌难鸣，英国本身尚且自顾不暇，对香港更是鞭长莫及，就找出他的同学，一位洪门兄弟（华人）和老人家商量，协助他维持港九治安，并拨给枪支交老人家转发洪门兄弟。日寇攻陷香港后，老人家即由家中迁往别处居住，以防不测。一天早上外出散步，突然被几个日本兵和汉奸劫持到日军司令部。原来日寇进港后，从黄堂开的照相馆中，搜取了那次欢迎会上的照相底版，知道了老人家的情况和面貌，就四出侦查，抓走了老人家。当即由日军司令官井崎出面，请老人家组织“香港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说这是为了香港人民，也是对老人家的信任和尊敬。老人家后来对我们说，我一见井崎就万分生气，立即想到在他们铁蹄蹂躏下的同胞，但为了应付，只得捺住火气，说我已八十多岁，腿脚又不好，新来香港，人地生疏，还是另请高明吧。井崎再三请老人家考虑考虑，老人家不答话。最后，井崎问：是住在司令部还是回家？老人家意识到他别有用心，想软禁在司令部。就很严肃地对他说：“我如果住在你们这里，外边出了什么事我可不负责任！全香港的人这时恐怕全都知道，我被你们抓走了。井崎连忙说请不要误会，当晚就派车送老人家回来了。后来知道，这时候廖承志先生已在筹划怎样保护老人家出险，我们也略有所闻。三天后，井崎派人送来一张“委任状”，老人家藉口向来没有被别人“委任”过，要求改为“聘请”，来人只好拿回委任状，说再和井崎商量商量。就在这天晚上得到出走的通知。我和老人家都化了装，老人家一向是穿西服的，这时改穿长皮袍；我穿短布衣，打扮成仆人的模样，跟随廖承志先生派来的人，坐上用两根竹竿绑在椅子上的“滑竿”，黑夜到了九龙。然后徒步爬山越岭，经深水埗、何东村到大埔。老人家拄着拐杖，我也精疲力尽。晚间，由大埔乘渔船往广东的澳头（即南澳）驶去。渔船才出港就遭到水上匪徒的开枪袭击，枪声引起了日寇的汽艇声，我们紧伏舱底，渔家不顾一切地急驶而去。现在想起来真是恐惧万分，随时有生命的危险。我估计，这渔船也是事先预备好的。船到澳头，立即有我党东江纵队的游击队员来迎接，这时才松了一口气。在大鹏湾游击队队部休息了三天，由游击队员护送向韶关进发。走到良井镇，忽遇日寇飞机，我们赶紧藏到树林中，飞机在空中盘旋十几分钟才走。韶关当时属国民党第七军区，司令长官是余汉谋，广东省政府主席是李汉魂。余汉谋部队要解除护送我们的游击队员武装，老人家大发脾气，要找余汉谋讲理，余汉谋托人说是“误会”，平安地送游击队员回了澳头。李汉魂把我们安置在一艘较大的游艇上，老人家和省政府参议朱树南等在一起，他们去美国时老人家曾招待过他们；我和香翰屏住在一起，香翰屏当时是一个地区的司令，等待去重庆的安排。

42年1月，我和老人家坐火车到了桂林。李济琛是桂林行辕主任，招待我们很周到，李宗仁、白崇禧都请吃饭。不久，乘飞机到了重庆，住枣子岚垭的中国饭店。老人家从小去美国，只会讲广东开平的家乡话，国语既不会说也不大听得懂。在两广境内有什么应酬，宾主还可以自由交谈，到了重庆就要我做翻译了。我的国语虽然不大好，但在那时候是不便叫别人参加一切活动的。住在重庆的第二天，周总理、邓大姐就来到中

国饭店，这是第一次见着二位。邓大姐先来，态度和蔼而大方，说明来意后，我们表示非常欢迎。周总理穿灰色西装，和我们一一握手，我顿时感到一股暖流贯彻了全身。由我翻译，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周总理说，改日要开正式的欢迎大会欢迎老人家。第二天，就有人送来一份《新华日报》我们看后随手放在桌上。这时国民党海外部长刘维炽来访，见到《新华日报》，惊讶地说：“这是共产党的报纸吗！”老人家说：“这报纸很好，说的是实话。”刘维炽苦笑了一下。五天后，我党驻重庆办事处通知开欢迎大会，我们刚到办事处大门口，总理等已在那里等候，共同照了相。从右起：第一位是邓大姐，第二位是黄兴的夫人徐宗汉，第三位是总理，第四位是老人家，第五位是董老（必武），第六是我。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到今天。回想起来，当时是多么光荣和幸福呀！竟能和亲爱的总理合影。

我记得，欢迎会是在办事处院内大棚下召开的，到有陶行知等进步人士一百多人。总理首先致词，盛赞老人家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从财力物力上给了很大帮助。又说，在抗日战争中，在经济上对我们也出了不少力。说老人家是一位爱国者，为侨胞排忧解难，对侨胞扶危济困等等。我坐在老人家身后，把总理的话一句一句地翻给老人家听，老人家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过奖了。”然后老人家发言，首先感谢这次欢迎会的召开，接着说明这次回国，了解到许多抗日救国的实际情况，一定把它带回去向侨胞宣传。最后说，爱国救国人人有责，今天我要站在广大人民一边，为国尽力等等。欢迎会开得非常成功，宾主都表明了态度。回中国饭店后，老人家再三嘱咐我：要认清是非，谁是真正抗日者，要跟着共产党走。国民党知道后，大为恐慌，戴笠、杜月笙等都极力来拉拢，老人家不得不表面敷衍，内心里已充分明白谁是真正抗日的了。在此期间，冯玉祥将军还请吃过饭，冯将军的作风是与众不同的，既没有要人作陪，也没有海参鱼翅，只比家常饭多两样菜而已。大概是彼此不太了解的缘故吧，对抗日情况，都未作深入的揭露，我也不敢错翻一个字。不过有的地方彼此是意在不言中而相互默契的。

老人家在重庆大约住了两个月，由国民党海外部长刘维炽陪同，见过蒋介石二、三次。我问老人家见蒋的情况，老人家常常摇头，有时只简单地说：“这个人很滑头，不可靠！”然后我们又回到韶关，探望亲戚朋友。大约在这年八月，我们又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会上的收获虽然不大，但和周总理的来往更亲密了，对国内的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了，因之，也就更加坚定对共产党的信心。在此期间，还在重庆开办了华侨兴业银行，老人家自任董事长，以便于国内外的汇款事宜。43年2月，老人家决定回美，临行前蒋介石特意设宴招待，叫老人家回美后，到全美各地去募集捐款，并说所需旅费由国民政府负担（结果后来一文未给）。同时，给了许多张亲笔签名的照片，叫给捐赠大宗款项的人。周总理也来送行，叫老人家把抗日的重要性和抗日真相告知全美华侨。事后，老人家对我说：“你看！这两种不同态度多么明显，一个是要钱，一个是救国，对蒋介石是不能共事的”。

老人家回美以后经常和我党人员或见面或通信，详细内容我就不知道了。总之，老人家这次回国的最大收获，是认清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问题上，谁是消极者，谁是

杨绍萱与《逼上梁山》

翟伯龙

杨绍萱生前寄给我一首《水调歌头》词，曰：“宇宙无休息，乾坤日夜浮。哪有天涯海角，浑园一地球”……

地球在不停地转动，人类历史长河滚滚向前。那些妄图颠倒历史，倒转乾坤的小丑们终究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二大”胜利召开，承先启后，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万户欢欣，九洲抖擞，历史在向前发展。

我的面前放着一张《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毛主席给文艺界人士的信，其中有《看了“逼上梁山”写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我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历史的公正又回来了！我低吟着“宇宙无休息，乾坤日夜浮，……”。

我的老师杨绍萱，河北省滦县人，他出生的时代正是充满了内忧外患的清朝光绪年间，在天津北洋法政学堂读书，然后又回到家乡滦县教中学，也在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教过书，杨绍萱送我的一套《增订殷墟书契改释》上面就有该校的校章。

据他说，裴学海先生就是他的学生，裴学海也是滦县人，专攻乾嘉学派高邮王氏之学，解放后，任教于河北大学，现已重印了裴氏的《古书虚字集释》。

后来，杨绍萱曾在“中国大学”教“西洋史”。杨绍萱对我说：“我教西洋史，是个无名小辈，当时西洋史的权威是高一涵”。

抗日战争爆发，杨绍萱辗转到了西安，经董必武同志介绍，投奔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工作，后任延安平剧院院长。解放后，曾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事业管理局副局长。

杨绍萱在陕北的窑洞里，参加了“文艺座谈会”，并且聆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杨绍萱破天荒头一次听到的。毛主席这一伟大的教诲引起了杨绍萱思想的深刻变化，也直接关系到他后来创作出《逼上梁山》。

听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杨绍萱着手创作平剧（京剧）《逼上梁山》。

我问他为什么要写《逼上梁山》？

他说：“那时，我们感到一些戏内容陈旧，不适合在延安演出，就想自己动手，写个新剧本”。

积极者，认清了中国的命运将由哪个党来掌握，从而认清了自己应何去何从，为以后十年光明而幸福的前途，播下了种子。

（沈信夫整理）

杨绍萱选中了《水浒传》中“林冲逼上梁山”这一部分，做为戏剧题材，最初也仅仅是想用这出戏来号召国民党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投到革命阵营中来。

杨绍萱是很熟悉中国戏剧史的，取材于林冲上梁山的戏剧可谓“古已有之”，如：李开先的《宝剑记》、杨小楼演出的《英雄血泪图》《野猪林》。杨绍萱没有照搬前人的成品，没有大肆渲染“英雄末路”，而是突出了“官逼民反”，所以说，开始的路就走对了。

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特别是在毛主席具体关心和指导下，《逼上梁山》剧本越改越好。

杨绍萱告诉我，毛主席曾两次观看《逼上梁山》的演出，并且要去看剧本，仔细研究。毛主席考虑的不仅仅是一个剧本问题，而是考虑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如何在文艺作品中体现的问题，即：文学艺术应如何体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一深刻的思想。

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毛主席给杨绍萱、齐燕铭写了这封信。在这封信中，毛主席对《逼上梁山》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且提出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应该是文艺舞台上的主人，对于过去“历史的颠倒”，应该再“颠过来”。

这封信，给了《逼上梁山》剧全体工作人员很大的鼓舞，更是对文艺创作的指导。

杨绍萱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困难的日子里，仍然一再对我说：“我写的剧，是毛主席肯定的！”这是多么可贵的一种信念，一种精神力量啊！十年浩劫期间，“四人帮”居然公开篡改历史，偷天换日，他们发表了这封信，将杨绍萱、齐燕铭的名字删掉，并删到了信中对郭沫若历史话剧的评价。

对“四人帮”这种“改头换面”“欺世盗名”行为，杨绍萱非常气愤，他给我拿出来毛主席这封亲笔信的照片底版和解放初期的一册戏剧杂志，戏剧杂志的名称，我现在忘记了，好像是《人民戏剧》或《华北戏剧》之类。在这期杂志上全文刊登了《毛主席看了“逼上梁山”后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

看起来，这封信解放后就公开发表了，而且杨绍萱等当事人尚在，“四人帮”就敢不择手段地篡改历史。其实“四人帮”一伙完全知道“逼上梁山”的创作始末，康生、江青当时就在延安。

我问杨绍萱，毛主席的那封亲笔信的下落。杨绍萱说，那封信由他珍贵地保存了近十年，后来中央为了保存毛主席的手迹——我党的重要历史文献，才派人将信取走，并拍摄了原信照片（信及信封），照片及底版留给杨绍萱作为纪念。照片之题，是当时杨绍萱写的。

杨绍萱曾对我谈到过齐燕铭同志，他说：“齐燕铭是蒙古族，家里有钱，专为他请过教京剧的教师，齐燕铭对京剧是内行，当时是‘逼上梁山’剧的导演”。

关于齐燕铭同志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他出身在官宦诗书之家，精文史，工书法篆刻，其实他还懂戏剧，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逼上梁山》剧中主要角色林冲的扮演者是金紫光同志，杨绍萱说，“金紫光是学西洋音乐的，能演京剧也很不简单”。解放后，北方昆曲剧院成立，金紫光是副院长，我曾在杨绍萱家里见过他。

金 鱼 池 和 北 京 金 鱼

宋 家 玲

头一次来到北京的人，漫步在宽阔的天坛路上，会迎面看到一个汽车站名——“金鱼池”。你一定寻思：南是天坛，北是楼群，东西是柏油大街，看不到一点水，何来鱼池之有？如能碰到附近的一个老住户，一打听，方知道：这地方，确实曾是池塘遍地。后来，历经沧桑、天翻地覆，一改旧日面貌，今天才完全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新北京的版图上。

金鱼池，过去作为一个地方，位置在天坛以北，东晓市大街以南，天桥以东，红桥以西。历来以出产北京金鱼而闻名于世。现在，让我们循着历史的遗踪，来看一看这块在老北京中很有点名气的地方是怎样变迁的；它在北京金鱼业的发展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这或许对识认我们的伟大首都有一定的帮助。

(一)

南宋时，金迁都北京，扩展旧城，兴建宫殿，在金鱼池一带郊野挖土，供建筑用。附近一些窑业作坊也起土烧砖，遂留下大大小小的窑坑。天长日久，积水成池，给养鱼造成了方便条件。

据史书载。金时，专门在这里设“鱼藻池”，“池上有殿，榜以‘瑶池’。”说明此

当年在延安演戏，绝无争名利，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情况，编者、导演、一般工作人员都可粉墨登场，同心协力，克服困难，这种精神仍值得发扬。

从一个上党梆子戏班子那里买了戏装，于是京剧（当时叫“平剧”）《逼上梁山》演出了。

到了六十年代初，北方昆曲剧院将《逼上梁山》改编成昆曲，由李紫贵同志导演，林冲的扮演者是著名昆曲武生侯永奎。

一天在长安戏院彩排，杨绍萱被邀请参加，见到李紫贵同志，演出结束，杨绍萱到后台和演员见面。这些情况都是杨绍萱告诉我的，以后此剧是否公演，我就不清楚了。这时已是“文化革命”的前夕。以后……

“宇宙无休息，乾坤日夜浮”

春回大地，党的“十二大”召开了！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给文艺界人士的十五封信，其中就有给杨绍萱、齐燕铭二人的这一封。

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了，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杨绍萱老师，安息吧！

1983.3.22.

地景致很美，类似今天的公园一般，且是北京金鱼的发源地。

到了明朝，从明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建造天坛，历时十四年建成。再加上几乎和这同时，明成祖朱棣大兴土木，改造北京城。大量泥土被挖走，使原来的窑坑、鱼池逐渐扩大增多。而金时的殿阁倒塌后，则没有再修。随着金鱼业的兴起，许多穷苦的渔工，便聚集于此，以“鱼儿活”为生。明末的刘侗、于奕正合著的《帝京景物略》曾描述这里的景况道：“池泓然也，居人界而塘之，柳垂覆之，岁种金鱼以为业。”“池荫一带，园亭多于人家，南低天坛，一望空阔”。直到清乾隆年间，有人记载这里还是“池广数十亩，分百余池”。可见，从金元起，直到明清，因皇族国戚，达官贵人蓄养金鱼日渐成风，并竞相高价购买新奇品种，故刺激金鱼池这个地方的金鱼业日趋兴旺起来。我们可以想见：当时，数十亩池塘星罗棋布，养鱼人家“界而塘之”，各自经营着自己的鱼池。池水荡漾，塘边垂柳依依，池的附近还建有园亭，北依市井，南临天坛；再加上端午走马等习俗，真的是：玩鱼赏景，好不热闹。《帝京景物略》上载道：“岁盛夏，游人携壶饮此，投饼饵，唼呷有声，其大者衔饵竟去。”一边饮酒，一边投饵池中，戏鱼为乐，确实别有一番情趣。王应翼的《金鱼池观鱼歌》，更形象地写出了游人投饵观鱼的情景和金鱼池景色的秀美：“素湍平静不潜鳞，柳匝烟垂敷荇藻。扬馨唾影复唾香，啜嚼吮金接昏晓。争投饼饵溅苔花，贪者竟攫廉者掉。”我们再从谭元礼的《晚晴步金鱼池》一诗中，又可领略夏日晚晴这个美好时刻的金鱼池的景象：“涌涌跃跃洗池塘，朱鱼拨刺表文质。接餐生水水气鲜，霞非赤日碧非莲。儿童拍手晚光内，如我如鱼急风烟。士女相呼看金鲫，欢尽趣竭饼饵掷。”夕光里，金鱼在池塘里拨刺有声地游来游去，赤红如霞，碧绿似莲，逗人喜爱。儿童拍手欢笑，跑来跑去，象游鱼一般自由快活。大人们，男男女女，说说笑笑，相互邀唤，到池边观鱼。之后，又投饼饵，引逗鱼儿嬉戏。从以上记载里，可以看出，金鱼池的金鱼吸引着大量游客；又加上绿树、园亭，风景宜人，因此这里成为京郊的一处游览胜地。

当时，金鱼池的金鱼已有多种，据史书载：“鱼之种，深赤曰‘金’，莹白曰‘银’，雪质墨章，赤质黄章，曰‘玳瑁’……鱼有异种者，白而朱其额曰‘鹤珠’，朱而白脊曰‘银鞍’，朱脊而白点七曰‘七星’，白脊而朱画八曰‘八卦’。有虾种者，名为‘银目’、‘金目’、‘双环’、‘四尾’之属。”鱼工们已知道“种放善变”，千方百计培养新品种，并已分出品种的优劣。对于金鱼死亡、病故，也基本找到了原因及防治的办法。对于金鱼的变异、发展，亦有了初步的研究。池养、盆养、和瓶养(即玻璃鱼缸养)也都有了。这些都为金鱼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另外，这里还是皇上存放粮食的地方，俗称“皇庄”。明朝，可以说是金鱼池地区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到了清代，在一段时间里，人们仍然常来此处游玩。这从李静山写的一首题为《金鱼池》的竹枝词中可以看出：“天坛北面水池深，大小鱼池映绿荫。曲径游人欣玩赏，手持气凸岸边寻。”绿荫、曲径、池水、金鱼……显然，这一切都还是吸引人的。但是到了清末，这里的景物已日渐衰败、破落。光绪十一年(1885年)编成的《京师坊巷志稿》，在提到金鱼池时就说：“园亭今无存者，惟金鱼，走马，俗尚犹存。”

(二)

从清末到芦沟桥事变之前，金鱼池一帝，垂柳被伐，园亭颓废，龙须沟污水流淌，其自然景色已不引起人们的兴趣，甚至反而令人生厌了，但它的金鱼业还曾兴盛过一个时候。

那时，天坛的北坛墙根下，有一溜低矮的房子，住着补锅的、焊洋铁壶的、打铁的、开木匠铺的……各种手艺人。隔着一条土路，对面就是自天桥折而向东流的龙须沟。从天坛北门向西，走不到二百米，龙须沟有一个向北去的沟岔，把整个金鱼池分成东池和西池两块地方。

大约民国初年，有一曾姓官僚从一些养鱼人家手里收买了西池的所有池塘，计有一百多亩地，二、三十个坑，加以整修，雇了徐家、张家、姚家等十几个鱼把式，开办了《知乐渔庄》。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该渔庄最是兴旺。经理是当过国民党文安县县长的曾云沛。他让手下的一个名叫赵德鹏的马弁做二当家和代理人，总管渔庄事务。后来，赵德鹏的儿子赵奎玉也在渔庄管事。当年，《知乐渔庄》是北京最大的金鱼养殖场（也兼养其他鱼），用吸水机给鱼坑换水，在那个时候已属先进之举了。营业部设在今向荣街北口一带。门口挂着一块黑漆金匾。夏季在室外摆列鱼盆，展销各种金鱼；冬天，则移至室内。前来观赏和购买金鱼的人，小至一般贫民百姓，大至官僚买办，使馆洋人都有。渔庄门口也常有小汽车停靠。另外，平时，渔庄还派渔工给那订购金鱼的有钱有势的人家送去上好的品种，还批发一般的金鱼给那些小鱼贩子。贩小金鱼卖的，大都是民国八年以来河北文安县发大水逃荒来的灾民，以民国二十六年逃来的灾民为最多。先后累计起来，大约有四百多户，二千多人。他们身住简陋的窝棚，贩来一点小金鱼到街上叫卖，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日子过得很艰难。他们就住在金鱼池东南边，那是旧北京的一个贫民窟。

《知乐渔庄》的东家残酷剥削渔工。有一渔把式，人称大徐，干到六十多岁时，被渔庄轰出，孤身一人，无依无靠，活活饿死路旁。

东金鱼池有徐家、牟家、张家经营的三个渔场。他们都住在牟家井，南边就是养鱼的池塘。他们的渔场，规模要小得多，一家只有几个坑。一般情况下不雇伙计，只靠全家人动手养鱼度日。他们都是养鱼世家，有的，从明朝起，祖先就在这儿干这一行。代代相传，传到徐世英、牟庆增这些人，已是第七代或第五代了。徐家祖上，还有人在清朝宫廷里当过渔工。他们有丰富的饲养金鱼的经验。但由于规模小，依靠“鱼儿活”，好光景下也只能勉强糊口。那时，在坑里养鱼，换水是用水管，一笕一笕地淘，一笕一笕地挑，劳动量很大。又要捞鱼虫，又要上街挑担叫卖，整日价起早贪黑，也是很辛苦的。如碰上鱼病、鱼死，日子就更难以维持。在金鱼经营淡季，他们也得和那些小鱼贩子一样，出外挑尖（挑嫁妆）、拉脚、或编草帘子、拧狗窝卖。不揽些活干，他们也难以度过生活难关。

老北京人都记得，过春节时，街上常常传来“卖大小金鱼罗”的叫卖声。那前后，走街串巷的小鱼贩子特别多。他们肩上一付挑子，前边是一个盛水的水笕，里边搭上夹板，把不同品种的金鱼分开，后头是一个大条筐，筐里装有琉璃厂吹制的极薄的玻璃鱼

缸，大小不等。开春，人们图个兴旺、吉利，花一角多钱，买个鱼缸，里面放上五、六条色彩鲜艳的小金鱼，再装入几枝绿色的杂草，看起来就很活泼痛快。“吉庆有余（鱼）”，这也许有点迷信色彩；但在那个年代里，新春伊始，人们盼望能有一个好兆头，这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赶会、逢集，是贩卖金鱼的好时机。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等地赶庙会、花市赶集，都有卖金鱼的。平日，天坛、厂甸、后门、鼓楼等地，也有摆地摆摊的小金鱼贩子。

那一段时间里，金鱼池一带除了东、西池的几个渔场外，牟家井的牟家开了《海泉居》茶馆，每日有说书、唱大鼓的为茶客演出。附近是《金台书院》，药王庙。与《知乐渔庄》门市部相对的是一个大商场。北边，是一盐商查家阔绰豪华的花园官邸。东边还有皮局子、骨头厂子。最东头有复兴粉房。东南边，有一座庙，俗称“老头庙”，每年阴历七月十五祭瘟神、放法船，一度也很热闹。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寇侵入中国，北京城的局势动荡不安，人们惶惶然不可终日，哪有心思再养金鱼？金鱼池的金鱼业日趋没落。已发展到五十余种的金鱼，越来越少。至解放前夕，《知乐渔庄》岌岌可危；张家渔场倒闭，弟兄俩改行开了棺材铺；其它几家渔场也濒灭亡的厄运。许多养鱼塘都变成了臭水坑。那条污水沟——龙须沟愈来愈泛滥，臭气熏天，蚊蝇遍地，给居住在这里的穷苦人民造成日益深重的灾难。

（三）

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后，人民政府即着手治理龙须沟。一九五〇年，把原来的明沟改为暗沟，使这一带卫生情况大为好转。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又组织义务劳动大军，填坑修湖。只一年多时间，便修成一个成“凹”状的元宝湖。池岸砌有水泥栏杆，沿岸种植垂柳，成了一个小型公园，属天坛公园管理。池里已不养鱼，可以划船。至此，金鱼池的面貌已大大改观。

解放前的那些饲养金鱼的鱼把式，在政府的安排下，有些到天坛公园、中山公园、北海公园、紫竹院公园等处仍旧从事金鱼养殖工作。如牟家的后人牟庆增、徐家的后人徐世英，在天坛公园渔场工作直到今天。

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北京金鱼已繁殖到七十多种，销售国内各省。

金鱼池进一步改变面目是在一九六五年。这一年，填平元宝湖，开始建居民楼。元宝湖自五十年代修成后，因是一片死水，时间一长，蚊蝇繁殖；再加上管理不善，水源缺乏，渐渐也变为一片污水。这样再保留它，价值就不大了。从六五年到六八年，金鱼池的最后一块水域被填死后，陆续盖起了一幢幢楼房。有三条主要街道：金鱼池东街、西街、中街，连同一些胡同，把几片楼房联接起来。除了居民住房外，还建起了两所中学和几个出产轻工产品的工厂以及两个规模较大的商场等。原来住在窝棚里和低矮平房里的贫苦百姓、渔工搬进了新楼，生活大为改善。

金鱼池不见了，但北京金鱼在以天坛公园渔场为主的各个公园及双桥渔场繁殖、蓄

说“寒 门”

高风山 李启元

“寒门”亦称“穷家门”，指的是乞丐这一行。在旧社会里，乞丐是最受苦的下等人了，他们走江湖串市井，沿街乞讨，风餐露宿，俗称“叫花子”。然而，乞丐这一行也有门户派别之分，也讲究师承关系，“寒门”这一行也有行规。下面介绍一些“寒门”中的轶事。

“寒门”共分十三派，即江南五派，江北五派，河北三派。江南五派活动于长江以南，这五派的名字是“桃、柳、杏、花、春。”他们在沿街乞讨时，间或唱几句自编的唱词，伴唱使用竹板。竹板分“大板”和“节子板”，敲击时左、右手分别操持。“大板”是用两块较厚的竹板以皮条相拴而成；“节子板”是用五块较薄的小竹板串成，板与板之间均衬装有两个小铜钱，以增润音响。在“节子板”最后一块竹板的里面分别刻有“桃子”、“柳叶”、“杏子”、“菊花”和“春”字，以区别门户派别的不同，作为本派标记。例如，内行人如看到使用刻有“柳叶”的“节子板”的人，就知道他是江南“柳派”门户中人了。江北五派是各按其祖师的姓氏命名的，为“丁、郭、范、高、齐”，他们大都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活动。他们行乞时伴唱所用的音响乐器有“三粒金”（也是竹板，亦称“三才板”），黄沙碗（用三个碗的碗沿合碰取声），“号筒”，也有播砖的，即用整块砖往胸前或背后相击；河北三派活动于黄河以北，名字是“朱、张、李”，也是以各自的祖师姓氏命名的。

养。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四人帮及林彪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路线，养殖和观赏金鱼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情调，金鱼业遭到极大的摧残。各公园的金鱼都集中到紫竹院，品种和数量都急剧下降。到一九七六年，北京金鱼只剩下三十种左右。

文化革命之后，金鱼业才逐渐恢复、发展。其中，以天坛公园渔场规模最大。场内，修了两幢宽大的养鱼室，室内都有水泥鱼池。场外修了240个水泥池子，主要供繁殖金鱼用。池子四周是一个个鱼盆，里面盛着“红头帽子”、“五花线球”、“五花珍珠”、“望天”、“泡眼”、“龙眼”、“龙眼球”、“翻腮”、“鹅头红”……等各色品种的成鱼，计有五十多个品种。这里，年产百万尾鱼苗，内销北京市和外省公园，外销香港、日本等地。北京金鱼还曾作为珍贵礼品赠送印尼、缅甸以及西哈努克亲王等外宾。

现在，天坛公园渔场已有了金鱼养殖工程师，开展了金鱼饲养和防病的科研工作。如“金鱼早期孵化”、“人工合成饵料”等课题，都取得较好的效果。原金鱼池的老渔把式徐世英还同亲戚一道总结金鱼的养殖经验，写出了《中国金鱼》一书，出版后，很受欢迎。北京出版社也出版了天坛公园渔场金鱼养殖工程师张韶华的科普读物《北京金鱼》。北京金鱼，作为北京的一种特殊的、活的艺术品、正在放射出新的光芒。

“寒门”这十三派又一说叫十二派半，是把“朱”派算作半派；相传，明太祖朱元璋称帝以前，因家境贫寒也当过乞者。朱元璋行乞时与张氏、李氏两个“叫花子”相识，但朱元璋既不全随张氏，也不全靠李氏，而各依其半，因而独树一帜，人称半派，“朱”派后来又称“寒三门”。

据传，朱元璋称帝后，对“寒门”行乞者依旧怀念、器重，并给“寒门”立了行规，封“寒门各派头目为“赶上吃”，一说为“杆儿上”。所谓“赶上吃”，即“寒门”各派头目走到哪里，可以吃到哪里，无论是宫宦的府邸，还是百姓之家，赶上就吃，谁也不准拒绝。一说“杆儿上”指“寒门”各派头目都有一根一尺三寸长的鞭杆子，杆子上装饰有用生丝制成的穗子，穗子上有七个结，中间的是个大结，大结的两边各有三个小结围绕。这带有七个结的鞭杆，叫“七星棵”，亦名“七星斗”。相传朱元璋称帝前给人家放过牛，他的放牛鞭子因使用日久皮条被抽断，相继接过七次，所以鞭子上留下七个结子。后来，“寒门”各派头目就用饰有七个结子的鞭杆作为标记了。朱元璋称帝后封“寒门”各派头目为“杆儿上”，“杆儿上”一词后又成了统管乞丐的头人的官衔名称。

清代沿明俗习，仍设“杆儿上”之职。“杆儿上”之职属半官半私性质，有顶子，没翎子；有褂子，没补子。“顶子”是清朝官吏的礼帽，“翎子”是插在礼帽上的孔雀翎，根据翎上翎眼的数量，表示官品的大小；“褂子”指清朝官吏的官服，“补子”指官服前胸后背上的图案，也用于表示官品的大小不同的。“杆儿上”这种有顶无翎，有褂无补的服饰待遇，说明了他们的似官非官的地位。这也是清王朝利用的手段，笼络“寒门”乞者归顺，别去造反。“杆儿上”跟“厅儿上”（清代时的地方官署名称）的官吏都有往来，除管理乞丐行乞外，后来还兼管泼街、水会（消防组织）等公益琐事。清朝灭亡后，“杆儿上”才逐渐消失。

“寒门”收徒要行拜师礼，亦称“拜杆儿”。一个叫花子入“寒门”要想以行乞为终生职业，除了要确认一名师傅（亦称“本师”）外，还要有个“引进师”（亦称“过湖师”即介绍人）和一名“保湖师”（即保证人，向“本师”保证收的徒弟可靠）。“本师”拿出“杆”来，徒弟向它参拜。取得与“本师”的师承关系后，才允许徒弟在“过湖师”或“保湖师”的势力范围内闯江湖，进行行乞活动。在一般情况下，徒弟很少在“本师”的势力范围内活动，以示对“本师”的尊重。

“寒门”收徒，一门之内论“仲”排辈，一“仲”为一辈，十“仲”为一番，满一番再翻回来按“仲”排辈。例如有两名乞丐同属于江“丁”家门，但一人是“丁”家三“仲”，另一人是“丁”家四“仲”，四“仲”的就比三“仲”的小一辈。小辈称长辈为师叔或师伯。

“寒门”中也有无派无师的，行内称为跑“海清”腿的。跑“海清”腿的行乞时所用的竹板不拴穗子，以区别入了门户有师承关系的人。这种无师无派跑“海清”腿的，可以到处活动，不受地区局限。如流落一方后，即或碰上入了门户属于当地势力范围的同行，只要亮出自己的家伙（即出示自己使用的竹板标记），并说明自己是跑“海清”腿的，也能“借地”顺利短期行乞，不致受到排挤；如果遇到有特殊为难之事，还

可以得到当地同行的周济，所以，行乞为业者有一辈子专门当跑“海清”腿的。

“寒门”行乞，各户派人均有自己的具体活动范围，称“道”，即划定几条街巷，这是由“杆儿上”给划定的。如要到给自己规定的以外地域行乞，就要说清楚自己的门户名称和“仲”辈关系，才允许“借”地短期行乞。这种对行乞的地域划分，是为了保证行乞者都有地盘，也是“寒门”这一行组织性、纪律性的一种表现，又是历代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清代时按“杆”上的红、白、蓝不同颜色，规定为“黄者不出城，蓝者天下行，白者白头到老。”即持黄穗杆的只准在京师城里活动，不准出城易地；持蓝色穗杆的可以到各地行乞，不受限制；持白穗杆的是门户中老当家的，表示其辈数大，资格老。

“寒门”行乞有许多行规戒律，主要有：只准行乞，不许奸淫妇女，不许偷盗抢劫，不准“顶包卖路”。所谓“顶包卖路”就是入了门户的乞者在走江湖中乘着在亲戚、朋友家借住的机会，偷了亲戚或朋友家里的东西，因而毁坏了“寒门”的名誉，这是绝对不许的。以上纪律违犯者要受处罚，由门户头目称作老当家的发话，责打几十木棍，以警效尤；劣迹昭彰者甚而被处死。

流入“寒门”的乞者，不都是目不识丁，也有读诗书，懂文墨的有识之士，但他们大都是怀才不遇，赶上天灾人祸，家道破落，生活无着，有的去卖字给人作“代书”，有的就流入“寒门”行乞。识诗书，懂文墨的“寒门”乞者，走江湖行乞时自编几句“顺口溜”，非诗非赋，但合辙押韵。初是发泄自己胸中的不满，讥讽时弊，以求知音；继而配上了竹板响乐，唱词的内容也变成了歌颂吉利之意，以求听众赏赐，权且苟延生命，这就是“数来宝”的渊源所在。“数来宝”原是乞者行乞时的唱词，无固定篇章，唱者随机应变，见景生情地随编随唱，初名“遛诗”，继称“顺口溜”、“流口辙”，后来才叫“数来宝”。

“寒门”乞者也有女人，北京在解放前尚可路见。但早期“寒门”女乞，年纪多在四、五十岁，有的是五、六人或七、八人群出，每人手里各拿一个瓦盆，名叫“女拨子”。“女拨子”合伙沿街串铺家门，往铺店门前一站，只喊一声：“掌柜的。”就不再言语。店家听到“女拨子”的喊声，得立即出门询问：“来几个人呀？”然后按“女拨子”来的人数各给些零钱了事。店家如不施舍，“女拨子”气急生事，撩起裙衫就往瓦盆里撒尿，顺手泼入店堂门内，弄得店家哭笑不得。另有单个女乞，手持一把布掸子，逢人就给掸尘土，名叫“掸尊”，以求施舍；如遇上不肯破费的人，她倒过掸子把就打，打完拔腿就跑，挨打的人只好白白叫苦。

“寒门”乞者向铺家行乞，若遇到有的店家吝啬，不肯解囊相助，那他是不轻易离去的，除了长时间击板高唱，招引行人围观，致使店门因之受阻外，甚而有的躺倒在店铺的门槛上，让同伙用一根铁制的穿钉，从嘴里将自己的脸腮穿通，把脸腮钉在门槛上，“寒门”行话叫“挂”上了，使人出入不了店门。“挂”上后，店主人如仍然不施舍，乞者能坚持在门槛上钉躺两三天，不吃也不动，使围观者日夜不绝，店堂为之堵塞。店家的生意自然是无法做了，只好暂时上板关张，但又不敢给他起钉子，因为起不好钉子再伤及人命，即事情就闹得更大了。这时店家被迫只有去找“杆儿上”求情，花大笔钱

花市这条街

专栏篇目:

花市——代前言
“小门”布店的生意经
上义栈及其阳泉铁锅
灶君庙的铁狮子

昔日的内明远
启元春秋
香飘十里大有蔚
福源长干鲜果品店

花市 (代前言)

陈德光

“梅白桃红借草濡，四时插鬓艳堪误。人工只欠回春手，除去京师到处无。”这首竹枝词是清人杨静亭所著《都门杂咏》中的一首，咏的是巧夺天工的匠人所制的妇女头饰花。这些插花，昔时都集中在花市交易，因而使花市不仅闻名京师，也享誉全国各地。

花市在崇文门外，街以市名。花市形成的确切年代待考，但据清吴长元著的《宸垣识略》中对花市已有记载推断，距今也有二百年了。

《燕京岁时记》载，自正月起凡初四、十四、二十四日花市皆有市。市上出售的插花有通草、绫绢、绛枝、摔头等，颇能混真。同书还载：花市附近还有个鸽子市。在路北一小巷内，可称是市中市，聚鸽品种多，珍品有鹤秀、银楞、玉环等。

花市以交易纸绢花为主，但也有鲜花销售场，系在路南黄家店胡同内一块隙地上。

每逢集日，游人如织，当然很多人不是来闲逛的，那是趸货下乡叫卖的花贩子。市上卖花的摊商以批发为主，他们多住附近，设有作坊。因此，花市一带手工作坊云集，使这地区颇具特色。街上店肆林立，浮摊比比皆是，皆可满足游人选购商品的需要。

花市作为驰名的一条古老街道，应有较完整的史料留存，但迟至清末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对花市的记述也不过聊聊几笔，民国期间关于花市的史料亦复阙如。欣闻本刊辟“花市这条街”栏，专发有关花市的史料，深感幸甚，诚挽救史料免遭湮没之胜举也。

1986年9月

了事。由“杆儿上”或“堆子”(进入民国以后，已无“杆儿上”，代之以“堆子”，“堆子”即看街打更的头目，与“寒门”串通)出面，前来拔钉子，扶走“挂”上的行乞者，帮助店家恢复营业。因此大小店铺为求生意顺利，平安无事，不被纷至沓来的乞者搅扰，都按月于初一、十五日分两次给“杆儿上”付花销。“杆儿上”将收到这笔钱，按期分给各个入了门的乞者。乞者从“杆儿上”分到哪家给的花销，对哪家店铺就逾门而过，不再行乞干扰。店家只要按期给“杆儿上”付花销，即使外地来的“寒门”别派登门行乞，“杆儿上”也出面劝阻，或早对其打招呼，不使店家重复被费。

昔日的内明远

铁恩寿

崇外东花市路北的内明远饭馆，解放前是个生熟牛羊肉铺。它自我祖父创立到我经营整整是三代人，到现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我家原住朝阳门外，我祖父铁明英于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前后（1900年前后）凑了点小本钱，在朝外大街路南喇嘛寺口，开设了个字号叫明远号的小面粉铺。当时除了那些拥有大片良田，资本雄厚的大粮店外，一般的小面粉铺都被称为“露晨行”，表明这些面粉铺都是些本微利薄的小买卖。我祖父见专卖面粉无法养家糊口，于是决定同时自宰自卖生牛肉。但由于朝外一带当时较为冷落人稀，虽然在明远号内增添了生牛肉买卖，可是生意仍不景气，于是1913年我祖父在崇外大街东花市东口路北找到了间门脸，在现在的内明远东边一点，将买卖迁到了这里。因为明远号是从朝外迁到了东便门内，故此我祖父将“号”字取消，改成了“内明远”。经营的项目也改变了，面粉取消了，成为专营生熟牛羊肉的铺子。东花市一带较朝外要热闹、繁华多了，可附近的同行也多了。“内明远”前后左右足有七、八家羊肉铺。要想使“内明远”既能在此立足，还要超过周围的同行，我祖父觉得首先必须赢得顾客的信任。一是东西要好，二是要称足，因此决定所出售的羊肉都用西口大羊，这种羊膘肥体大，肉质鲜嫩。每年六、七月份当羊正处在膘瘦价低的时候，就从德胜门马甸或京东夏垫等处购进一批西口羊，放在城边的农户家中寄养。这些农户只要羊粪，不要其他费用。秋后这批羊个个肥大，也正是羊肉买卖的旺季，就随卖随往上赶。这样羊肉的成本既低，肉质又鲜嫩。出售生肉的时候，不但要做到“一刀准”，还要做到切出的肉“漂亮”。肉切的要肥瘦相当，让顾客看到切的这块肉满意，剩下的肉还得让后来的顾客觉得不错。那种“跑砣纳油十四两”的作风是不足取的，顾客见到秤砣已经高高往上翘，甚至翘得都使秤砣滑下来了，还往秤上再添点，可回家一秤都不足份量。这样做买卖虽然能沾点小便宜，但却失去了顾客的信任，买卖绝长不了，因此我祖父规定无论是谁站柜台卖肉，决不准缺斤短两，就这样“内明远”逐渐获得了顾客的信任。那时的牛羊肉铺大多是上午卖生肉，下午卖熟肉。卖生肉“内明远”在崇外一带已经名誉显著，但在熟肉买卖上怎样才能远近驰名呢？

“寒门”各派，直至清代末叶仍以行乞为主，虽然用竹板、合扇、黄沙盅、号角等击乐，说几句顺口溜，唱几句歌颂吉利之词，但这目的只是讨得施主喜欢，容易乞到钱物。清末叶后，“寒门”中人渐渐分化，有的走江湖仍为乞丐，以乞食为业；有的根据个人擅长爱好，又苦心钻研，逐渐发展并掌握了一门弹拉说唱表演的技艺，这种人已不再是一个乞食者，而成了凭自己的独特技艺走江湖卖艺谋生的艺人了。

（陈德光整理）